



庐山诗话

“三不朽”王阳明与天池寺刻诗

■ 李 震

1996年，庐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鉴定意见评价相当高：“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庐山石刻作为庐山历史遗迹的组成部分，是庐山历史文化的重要文字记载，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1959年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首批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就包括了庐山石刻四处（仙人洞石刻、九十九盘石刻、天池寺石刻、黄龙寺石刻）。其中天池寺石刻中以王守仁的石刻诗最有文化价值。

“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这首诗刻于天池寺旁的一块巨石上，为明代王守仁所书。据史料记载，这首诗是题为《夜宿天池，月下闻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中的第一首，三首诗原本均刻石于天池寺旁，现仅存此一首，是王守仁正德十五年（1520年）游览天池寺时所作。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是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他创立的心学被称为“阳明学”，因此现在一般都称他为王阳明。

王守仁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圣贤，后人把他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创立的阳明心学认为“心即理”，以“致良知”为主旨，主张“知行合一”，影响了中国思想界500年。他一生追求圣贤、追求光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他不仅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宁王之乱。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宗室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兵锋直指南都（南京）。此时王守仁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手中并无军队可调。他对朱宸濠实施缓兵之计，一方面散布各路勤王大军正向南昌集结的假消息吓唬朱宸濠，同时离间朱宸濠与其亲信谋士的关系，使其不敢听从立即发兵的建议，导致朱宸濠大军在南昌逡巡长达十几天。王守仁利用这十几天时间，迅速招募组织起一支七八万人的民兵武装，为平叛打下了基础。朱宸濠意识到中计之后，发兵迅速攻取了南康（今庐山市）和九江，直逼南京的门户安庆。王守仁又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全力攻陷了朱宸濠的老巢南昌，迫使其回援，并在途中层层设伏，不断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最后与朱宸濠在鄱阳湖展开决战。在决定命运的水战中，王守仁见朱宸濠将大船用铁索连在一起，结成方阵，便复制了火烧赤壁的经典战例。他效仿诸葛亮，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叛军的船队，一举擒获了朱宸濠及其主要党羽。随后，他又率部收复南康、九江，仅用43天就全面平息了宁王之乱。此时，朝廷平叛大军在明武

宗朱厚照御驾亲征下，才刚刚离开京城。王守仁因此战获得“大明军神”美誉。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守仁平定叛乱后“凯旋驻师庐山以待朝命”，使他有机会数次游历了庐山。他首先到了山下的秀峰，在开先寺后悬崖刻立了一块《记功碑》，碑文记载了自己率部平定宁王叛乱，并生擒朱宸濠的事迹，将参战官员及将领名字悉数刻在崖壁上。随后，他登上庐山游览了天池寺。其诗《夜宿天池，月下闻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即为这年春天所作。

天池寺位于庐山天池峰顶，因寺前有天池而得名。天池实际是一泓池水，传说为文殊菩萨开化时以两手插石，成为两池，池中有泉水涌出，终年不涸。天池有一奇特之处：池水泛起气泡时，山下即起层云，非常灵验。因此天池“泉涌云兴”的神异景象，吸引了不少游人。其实这是因为池水中含有气体，会随着气压的下降形成气泡浮上水面。因此每逢阴雨天时池水就会沸涌泛泡。而天晴时，气压较高，气体能够溶入水中，便不会大冒泡。当时的人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便认为是一种神异现象，这也是天池得名的原因吧。王守仁在《夜宿天池，月下闻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其三）》中，描写了天池的这种奇特现象。“天池之水近无风，水魅山妖竞偷取。公然又盗岩石云，却向人间作风雨。”

天池寺在明代是庐山声名最为显赫的寺院，地位极其特殊。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后来在与陈友谅争夺江山时，据称得到了庐山僧人周癫的“神助”。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下令敕封庐山为“庐岳”，与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等五岳并列，以提高庐山的地位，表彰庐山的功绩。同时，他还敕封庐山天池寺为“天池护国寺”，赐给天池寺铜钟、象鼓、乌金太子像等法物，并且规定南康、九江两府春秋两季要“合祀天池寺”。每年元旦，庐山各寺庙的僧人都要前往天池寺敬香朝拜，这也是定例。后来，明成祖朱棣又敕“天池万寿寺”额，明宣宗朱瞻基重修殿宇，“再敕天池妙吉祥寺”。有明朝皇帝的尊崇，使得天池寺不仅成为僧俗竞相上香的所在，又是官府祭拜的地方，还成为文人墨客经常造访的名胜，因而寺中不仅经藏法物极多，还藏有极为丰富的诗文和书法墨宝。明末清初的诗人王士禛曾有天池寺“四壁题咏皆已满”的记述。王守仁在天池寺所作诗的真迹也为寺僧所藏，并“什袭珍藏”，奉为至宝。王守仁的诗语言简洁明快，风格“秀逸有致”；他的书法则古朴遒劲，王士禛将之与颜真卿作比。因而凡是来天池寺的游人，必须要观赏其诗书，常常会“反复捧诵，珍重不能释手”。可惜天池寺在明代以后，渐趋衰落，至清代已毁败无余。进入民国，天池寺只剩下几间破屋，及至日军侵占庐山后完全被毁，寺中丰富的藏品，包括御赐的

古代诗词中的“秋”

■ 王家华

“天凉好个秋”。在古代诗词的世界里，秋天无疑是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季节。它不像春天那般生机勃勃，繁花似锦，也不像夏天那般热烈奔放、郁郁葱葱，更不像冬天那样寒冷萧瑟、白雪皑皑。秋天，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深沉的气质，引发了无数迁客骚人的感慨与思索。

秋天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唐代诗人杜牧曾写道：“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那经霜的枫叶，比二月的春花还要鲜艳夺目，宛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在秋风中摇曳生姿。满山的红叶，如同一幅绚丽的画卷，展现出秋天的热烈与奔放。“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笔端的千古绝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宁静而壮美的秋日黄昏图景。晚霞映照着秋水，孤鹜在天空中翱翔，水天相接，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色彩和谐、意境开阔的自然画面。而白居易《暮江吟》中“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诗句，则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深秋时节傍晚时分的江面风景。夕阳西下，霞光满天，彩云飘飘，水波粼粼，浮光掠影，水天相映，与王勃

笔下的秋色美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秋天的色彩，既有枫叶的火红，又有银杏的金黄；既有菊花的五彩斑斓，又有天空的湛蓝高远。这些丰富多彩的唯美风光，交织成了秋天独特的无限魅力。

秋天也是一个充满诗情与浪漫的世界。“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笔下的秋天，清新脱俗，宁静悠远。一场新雨过后，山谷里显得格外清新，夜晚的秋意更加浓厚。明月透过松林洒下斑驳的光影，清澈的泉水在山石间潺潺流淌。在这静谧的秋夜，诗人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感受着内心的宁静与平和。而李煜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则充满了孤独与哀怨。诗人独自登上西楼，望着夜空如钩的残月，庭院里的梧桐在秋风中瑟瑟发抖，仿佛被这清冷的秋天所禁锢。秋天的诗，或清新，或哀怨，或宁静，或寂寞，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最敏感的神经。

秋天更是一个充满离愁别绪的世界。柳永在《雨霖铃》中写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在这清冷的

《大藏经》、龙藏金字牌，以及历代皇帝敕书等，都已毁损殆尽了。

王守仁的庐山之行，在天池寺一共留下了四首绝句，除以上所述“夜宿天池，月下闻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外，还有一首《文殊台夜观佛灯诗》：“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搜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

文殊台为明时建筑，据说高丈许，今已不存。王守仁这首诗形象地表现了在天池寺的文殊台观“佛灯”时见到的奇妙景象。所谓“佛灯”是天池寺除天池外的另一种奇异景象。每当入夜，在文殊台附近的山林间，常常可以看见忽明忽灭、闪烁变幻的神奇火光，僧人们认为那是文殊菩萨显光，称之为“佛灯”。当时游人见此景象，十分吃惊，也认为是神物。宋代诗人王庭珪曾描述在天池寺夜间拜灯的情景，“拜未起而灯光灿发于栏楯之外，大数百余灯，明灭合散不常，……窃意名山蕴灵，必有神物。”其实那不过是山间磷物质产生的磷光，在空气流动和山峦中薄雾的作用下，产生了神奇莫测的景象，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

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其核心是人生哲学，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人成圣。他认为“心即理”，要求人们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自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强调“致良知”，要求人们无论做人做事始终坚守端正本心；他主张知行合一，要求人们在思想源头上就要树立善的理念，清除恶的念头。

王守仁是心学集大成者，更是心学实践的楷模。他曾经两次科考不第，初出仕就因为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廷杖四十，贬谪至荒僻的贵州龙场当驿丞，几欲丧命。平宁王之乱，他立下不世之功，不但未得到朝廷奖赏，反因功高盖主，抢了明武宗朱厚照的风头，遭到毁谤与陷害，险遭不测。纵观其一生，可谓历尽坎坷，却始终不改至贤之志，终成一代完人。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1月），王守仁病逝于江西大余县，其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一生光明磊落，无愧于心，自然无需多言了。王守仁被后世尊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贤。因此，阳明心学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功夫，还有人格魅力。梁启超曾说：人生痛苦“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阳明心学之法去做”，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也都从阳明心学中汲取智慧力量。正因为如此，王守仁的思想超越时空、跨越国界，不仅在中国，还在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都有众多拥趸，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阳明心学依然具有重要启示和积极的指导意义。

王守仁游历庐山并留下石刻诗是对庐山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贡献，是文化圣山值得骄傲的荣耀。庐山这一历史遗迹极其珍贵，是宝贵的文化遗产，理应得到很好保护和传承。

秋天，匆匆的别离更加显得令人心碎。诗人借酒消愁，却不知酒醒之后将身处何方？唯有杨柳岸边的晓风和天边的一弯残月与之相伴。而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更是将秋天的凄凉与内心的愁苦融为一体。在这乍暖还寒的时节，诗人独自一人苦苦寻觅着温暖与安慰，到头来却只感受到了无边的冷清与孤寂。秋天的离愁别绪，如同一首首哀婉的离歌，诉说着人们心中的不舍与思念。

然而，秋天并不仅仅是悲伤与凄凉的象征，它也蕴含着人们对人生的美好向往和深刻感悟。刘禹锡曾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在他看来，秋天并不比春天逊色，反而更能激发人们的豪情壮志。那直冲云霄的白鹤，展现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作者的诗情随之飞扬。秋天，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轮回与更替。正如树叶在秋天凋零，是为了来年春天更好地生长；人生中的挫折与困难，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坚强、更加成熟。秋天的收获，让我们明白了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只有在春天及时播种，夏天辛勤耕耘，并努力拼搏，才能在秋天迎来丰硕的成果。

秋天，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是一幅永远画不完的画面，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让我们在古代诗词的引领下，用真心去感受秋天的美好，用智慧去解读秋天的密码，用勇气去迎接人生的秋季。因为，每一个秋天，都是心灵的一次洗礼，都是生命的一次经历。

世，当朝翰林院学士、文学家程钜夫闻之，含悲洒泪赋诗以赠，诗云：“君在山中住，青山深复深。泉声傍户细，树色过墙阴。接竹惟浇药，看松亦抱琴。如今无复见，空有夜猿吟。”

走进八门这座幽静的古村，目之所及，无论是斑斑驳驳的老屋，还是忽宽忽窄的麻石小径，无不给人以沧桑古朴之感。村里的房屋多为清末民初建筑，以三重进、五重进居多，造型别致，布局严谨。屋内砖雕、石雕、木雕、壁画典雅美观、栩栩如生，墙瓦间中式花格窗棂玲珑剔透。无论步入哪个院落，都可通过一个个小门游遍全村，寻找到岁月流逝的痕迹。

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幢七重进“官厅”。这是一座用青砖砌筑，板瓦覆顶，前伸重檐，呈前出廊格局的房屋，就连南北两边的附屋都是一式水磨青砖。屋内立柱上、梁枋间的木雕悉为双面对称镂空雕，其风格之独特、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据了解，建造这幢官厅历时12年，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浑堪称一流。门墙正上方“世绪维新”四字为清代名臣、文学家袁日修所题，厅堂内高悬“金榜题名”“名寿俱芳”匾额。官厅前耸立着30多根五六米高的石旗杆。旗杆底座形制不一，或方形，或六角形，或八角形。旗杆顶端镌刻着毛笔、坐狮等雕饰。这些石旗杆，在古代是功名、地位、权势的象征，曾经给八门村叶氏家族带来无上荣耀。

令人称奇的还有村中那一口口古井，井口或呈圆筒形、圆台形，井壁用青石砌成，大旱不涸，雨天不溢，一年四季清泉汩汩，醇美甘甜；暑天饮之解渴、生津、提神。井边的青石板经年累月被雨水冲刷，已变得光滑锃亮，青苔斑驳。正是这一泓泓盈盈清流，让八门村变得如此有灵性。



G 钩沉



“神探”狄仁杰

■ 冯晓晖

2004年，由已故著名演员梁冠华主演的《神探狄仁杰》播出，一句“元芳，你怎么看？”风靡全国。不仅在当代，百余年来，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狄仁杰得到了各个阶层众口一词的赞颂。他的名气甚至超越国界，为欧美人民广泛熟知。在国外，狄仁杰的名气远超诸葛亮。

人们称他为大唐名相。唐朝近300年历史中，除了唐太宗时期的谏议大夫魏征，没有谁的正面评价能盖过狄仁杰。他刚正廉明，敢于犯颜直谏，尤其是力劝武则天续立唐嗣，使唐祚得以维系，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为国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狄仁杰的政治生命虽然很长，但在朝为相的时间却并不多。他30岁从政，70岁去世，40年间大多在各地任职，即便是在京城，大多时间也是任中下级官吏。他有两任宰相的经历，第一次在武则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61岁，但仅仅4个月后被酷吏来俊臣诬告谋反，蒙冤入狱，后被贬为彭泽县令。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在彭泽任县令4年后，狄仁杰再次被武则天起用，升任魏州刺史。神功元年（697年）十月，被武则天召回朝中，恢复宰相职务，直至久视元年九月辛丑日（700年11月11日）去世。狄仁杰两次任宰相，合计约3年4个月，甚至比不上他在彭泽县令任职的时间长。

狄仁杰是从“干吏”成长起来的“名臣”，他对唐代司法的影响更大。狄仁杰在彭泽4年的事迹也体现了他作为“干吏”的廉洁爱民的风范。692年夏天到任彭泽时，狄仁杰已62岁。唐代彭泽隶属于江州，县治在今彭泽县黄岭乡，它的辖区包括现在的彭泽县和湖口县。由于湖口县在五代十国时期才从彭泽县分出来，因此湖口博物馆里也有纪念狄仁杰的展览。狄仁杰到彭泽后，见当地大旱，民不聊生，就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免当地赋税。

武则天准其所奏。作为一个贬官，到任之后立即申请给本地免赋并得到批准，一方面说明狄仁杰爱民如子，另一方面也说明武则天对他很欣赏。狄仁杰在彭泽期间，不仅勤政爱民，而且办案开明、判案如神。他在掌握和了解全县情况之后开始处理前任的积案，发现其中有许多冤假错案，他对300余名囚犯逐一问审，悉辨冤情。《新唐书》载，彭泽人民在狄仁杰离任时为他建了生祠，岁岁祭祀。

在狄仁杰的事迹中，被广为传颂的是他在上元二年（675年）任大理寺丞期间的事。当时，大理寺一年内判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当中无人再次上诉，一时声名大振。大理寺丞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一年之内判决一万多人并不奇怪，毕竟有些大案株连人数甚多，但没人上诉就令人费解了。除非将所有人当庭释放（传说中狄仁杰在彭泽就是这么干的），如果秉公办案，有的放有的杀，那些狡诈险恶之人，即便是罪有应得，真的就会甘心俯首吗？除非，连上诉的机会也没有。

且不去讨论历史记载的可信度，狄仁杰的这类办案的事迹，才是他获得大名声并深受后世崇敬的缘故。

就如通俗小说《三国演义》让一大批文臣武将的故事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一样。狄仁杰从名臣干吏转变为“神探”，源于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特别的门类——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亦称讼案小说，诞生于明代万历年间，从话本故事演变而来，主要描写作案和断案。其代表作品《包公案》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神探”——包拯。到了清朝中期，公案小说开始向章回体、武侠化转变，以《施公案》最为有名。清光绪年间，一本64回目的作者不详的公案小说横空出世，名为《狄公案》，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或《狄梁公全传》。不同于以前的公案小说，本书塑造了一个足智多谋又德才兼备的清官形象，情节细致缜密，并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包公案》《施公案》和《狄公案》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公案小说。这些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是百姓理想中的清官，已与原型相距甚远。从清末起，被广为传颂、交口称赞的狄仁杰，是小说中断案如神的狄公，早已超越了他的原型——名臣干吏狄仁杰。

狄公故事不仅传遍东亚文化圈，还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成为世界级的“东方神探”。1940年，荷兰人高罗佩在日本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狄公案》，他大为欣赏，将其翻译为英文。高罗佩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理解的著名汉学家，他总结了中国公案小说中存在的不为现代欧美读者所接受的一些问题，1950年开始，他借鉴欧洲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法，将《狄公案》故事进行改写成为英文版的推理小说，名为《大唐狄公案》（英文：Judge Dee）。因其带有东方神秘主义元素，大受欧美读者的欢迎。高罗佩此后继续创作以“狄公”为主人公的系列侦探推理小说，前后出版多达24本，并被翻译成各国语言，改编为多部电影和连环画等。

由于狄公的符号如此受欢迎，数位欧美作家在高罗佩之后继续撰写“狄公案”。欧美的狄公案，其本质就是披上东方黄皮肤的福尔摩斯探索集，与唐代那位名臣干吏狄仁杰，大约仅有姓名和身份上的相同性。

民国初年，福尔摩斯为主角的侦探小说开始进入中国，公案小说逐渐退出艺术舞台。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公案小说中的人物又出现在新创作的艺术作品中。但直到2000年以后，在小说和影视剧种，狄仁杰只是武则天的配角，扮演着机敏正直却又单调刻板的良好角色。

2004年，由梁冠华主演的《神探狄仁杰》播出，之后在十年间连出多个续集，使狄仁杰超越包公、海公，受到更普遍的欢迎。这是因为包公和海瑞的形象早已固定，观众感到审美疲劳，而狄公的形象本就模糊，可创作的空间更大。

2010年以后，不仅狄仁杰为主体的电视剧接连开拍，还多次搬上了银幕。华谊公司的狄仁杰系列，将这位“神探”进一步神化，飞天走壁之功都来了，妖魔鬼怪一起上，故事越编越离谱，颇似当年公案小说的怪怪模样。

在“神探狄仁杰”的故事中，《狄公案》写的是狄仁杰出任昌平县令，《大唐狄公案》系列故事，发生在狄仁杰在兰坊县、蒲阳县、蓬莱县、汉源县担任县令期间。其实狄仁杰的官宦生涯中，明确只担任过四年彭泽县令，小说中那些县令职位都是作者们杜撰的。令九江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作者写狄仁杰在彭泽的探案故事。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写几本《神探狄仁杰在彭泽》？

元芳，你怎么看？



F 风土

叶氏的发源地——八门古村

■ 肖介汉

永修县吴城镇西南约2.8公里处有个名叫马头洼的地方，这里坐落着一座幽静的古村——八门村。该村自然景色优美，人文气息浓郁。

早在西汉末年，马头洼便有人类劳作生息，当年吴郡（今浙江富阳）大富翁孙仲就在那里雇佃户人开荒辟地，种瓜收籽，其中不少是程、陶、张、谈、熊、王、涂各姓先民。

南宋淳祐年间（1250年前后），叶氏88世祖叶俊杰自洪州龙兴府豫宁南乡（今武宁县罗溪乡）廉村迁徙至新建县吴城（今永修吴城）后河柏叶垅，凿饮耕食，成为吴城叶氏一脉开基始祖。之后，叶升“具远志，以市廛湫隘居，弗可久长日”，亦恐“子孙市居习于刻薄，弗能昌大后裔”，见马头洼土膏田腴，水秀山清，“乃宜居宜业之地也”，遂继迁于此，择向阳处居之，取名“大白垅”，与周边的牛屎垅、窑儿垅、燕子垅、松树垅、斑鸠垅、泉水凶、竹山岭、鲤鱼垅并称“九龙拜寿”。大白垅遂成为吴城十大姓氏之一——叶氏的发源地。

吴城叶氏历经几代后，叶汉材留居大白垅开枝发叶，并将大白垅易名为“八门”，其余各支另辟新址。

有的迁居至南昌、进贤、德安、湖口、星子、都昌、鄱阳、新干及安徽太湖、休宁、潜山、陕西南洛，湖广潜江，湖北浠水诸地开宗发族；有的广布于吴城赣江东西两岸的村落，形成“赣江两岸叶连天”之宏昌景象。留居吴城的叶氏后裔瓜瓞康续，人丁渐增，“绵亘吴山之阳，夹居东西两浒，田连阡陌，为吴城一旺族矣”。

700多年来，八门叶氏族人秉承“孝为先，和为贵”“勤耕读，尚诗书”之理念，科甲绵延，文武猬集，才俊辈出。历史上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者，有宋淳祐四年（1244年）甲辰进士、大理寺评事叶升；宋咸淳年间选官授洪州总辖叶云卿；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进士、钦点刑部主事叶久濬；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进士、福建知县叶湘，中宪大夫叶式典；贵州石阡府通判叶茂，山东东昌府都司、怀远将军叶鼎发，山东茌平县知县、河南直隶陕州知州、曹州府知府叶敏，江西南昌水师营把总叶正兴，蔚州知州叶庭和，山东莒州知州叶广和。还有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叶切芳，他曾被推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会议并发言。

元延祐四年（1317年）七月，吴城叶氏的叶庭芳谢